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五〇二次会议

2023年12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蒙塔尔沃·索萨先生.....	(厄瓜多尔)
成员：	阿尔巴尼亚 .....	斯塔斯托利先生
	巴西.....	莫雷蒂先生
	中国.....	耿爽先生
	法国.....	迪梅·拉比勒夫人
	加蓬.....	比昂先生
	加纳.....	科尔比耶先生
	日本.....	长野先生
	马耳他.....	盖特女士
	莫桑比克.....	弗尔南德斯先生
	俄罗斯联邦 .....	扎博洛茨卡亚女士
	瑞士.....	钱达夫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扎姆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维克拉马辛哈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西蒙诺夫先生

议程项目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秘书长关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说明(S/2023/56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 秘书长关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说明 (S/2023/566)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卢旺达和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首席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566，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说明。

我现在请加蒂·桑塔纳法官发言。

**加蒂·桑塔纳法官** (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表示赞赏对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支持。

(以英语发言)

1948年12月9日，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次日，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当安理会把这两项文书作为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和卢旺达问题法庭的基石时，它们所激起的希望涟漪形成了波浪。这两个开创性机构自纽伦堡审判以来首次表明，社会谴责仇恨及仇恨罪行，并相应地希望在冲突后公平地确定责任，这些不只是愿望而已，而是国际社会将保证出现的情形。两个特设法庭追究了数百名知名罪犯的责任，其中许多人当时在其国内逍遥法外。

余留机制生动地提醒我们，大会75年前作出承诺，而本机构约30年前采取行动，将这些承诺付诸落实，以应对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遭受的破坏。我们继续表明：只要国际社会共同做出努力，正义就会得到伸张；这种正义将是公正的；我们将坚持到底，直至完成我们的工作。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申明这些理想，赞扬对余留机制的授权，并表达完成这项工作的决心。我要自豪地指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我之前于6月份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见S/PV.9344），余留机制的情况与现在大不一样。自那时以来，发生了决定性的事件，余留机制终于过渡到新的、真正的最后阶段。在9月份无限期中止菲利西安·卡布加一案的诉讼程序后，我们已没有与核心罪行有关的正在进行的审判或上诉。同时，在审判分庭处理临时释放卡布加先生的问题期间，卡布加先生仍被关押在海牙联合国拘留所。辩护律师正在书记官长的协助下，积极地努力确定一个适当的释放地点，并定于12月13日举行情况会商，讨论这些事项。此外，10月份有条件地确定，卡布加先生并非穷困之人，如果能够动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先前冻结的资产，他将有能力支付全部辩护费用。确定收回与卡布加有关的辩护支出的可行性并最终将其收回对余留机制至关重要。

另外，在检察官办公室的努力下，余留机制离完成追踪逃犯的责任又近了一步。11月15日，它宣布，逃犯阿罗伊斯·恩丁巴提已死亡。此人最初于1995年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所涉案件已移交卢旺达。虽然恩丁巴提先生一案是否终止审理尚待裁定，但我要衷心祝贺检察官及其追踪团队取得这一结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了结此案。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通缉的嫌犯现在只剩两人在逃，预计他们都将根据相关的移交决定在卢旺达受审。

鉴于特设法庭余留的司法工作大部分已基本完成，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余留机制正集中精力规划未来，并最终逐步结束其业务。我们正在努力工作，以满足安理会的期望，并充分回应第

2637 (2022) 号决议的相关内容以及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先前提出的建议。

我调整了我主席任期内的优先事项，以更好地反映余留机制生命中的这一新篇章。就在昨天，我向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根据我的第一优先事项完成各项职能的行动框架草案。我的第二个优先事项是，有效发挥领导作用，并实行善治。我打算彰显透明度和责任感价值，并表明一个资源有限的机构仍然可以保持最高的业绩标准。我的第三个优先事项是，确保我们在问责方面的共同遗产得到维护，并发出强有力的威慑信息，尤其是在余留机制受理的核心罪行案件已审结的情况下。

这些优先事项中的每一项都体现了更加面向未来的方针，同时在框架草案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余留机制的精心规划。考虑到司法职能小组编写的报告和其他意见，这份综合文件列出了余留机制的剩余职能、其预计完成日期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可能移交这些活动的备选方案和建议。文件还指出，余留机制正在努力查明可以通过合并、重组和精简我们的内部框架和程序来提高效率的领域。

我们已开始与非正式工作组讨论该文件，并热切期待着有机会在即将对我们的工作进展进行的第五次审查期间密切协作。由于所涉问题十分复杂，余留机制竭尽全力，及时向非正式工作组提交了框架。我们相信，提出的信息和建议将为安理会就我们各项工作的未来作出决定提供有益的依据。余留机制还积极与监督厅合作，评价余留机制的方法和工作，这一次的重点是余留机制与利益攸关方的接触。就在上周，监督厅提出了一些工作层面的初步调查结果，我们期待在适当的时候收到其完整报告。

在专注于未来规划活动的同时，我们还响应各国提出的援助请求，监测移交的案件，管理档案，确保不断保护受害者和证人，并履行其他持续的司法职能——换言之，确保尽最大努力完成安理会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尽管我们进入收尾阶段，但仍有许多工

作要做，即使我们前进的步伐变得更短，我们仍意识到需要继续前行。

上周的《灭绝种族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周年纪念提醒我们，当国际社会集体应对对我们人类的威胁时，它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与此同时，自1948年以来的几十年表明，国际法的确立可能会很缓慢，原则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得到支持，正义的弧线是漫长的。因此，必须留出一定的时间来确保这一进程能够顺利进行。

在特设法庭和余留机制，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些动态。我们看到，确保国际刑事司法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旅程，是一项长期投资，需要的支持远远超出了作出判决的范围。在急于开始调查和起诉的过程中，国际社会似乎低估了司法终了周期对整个项目完整性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现存的国际刑事法庭来指引方向。

接下来谈一谈判决后可能出现的一些困难，也是余留机制目前面临的困难。例如，在执行判决方面，30年前没有预见到的复杂性导致了最近的严峻挑战。一些被定罪的人被无法继续执行相关判决的国家送回海牙的联合国拘留所，这给余留机制和东道国都带来了负担，基本上使拘留所成了一座监狱。不幸的是，我们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不断遇到这个问题。对此，应采取政治解决方案。余留机制迫切需要更多的国家自愿协助履行这一授权职能，或者需要现有的执行国接收更多的被定罪者。我们认识到执法的责任可能很重，我们向我们的12个执法国表示敬意，它们对国际刑事司法所表现出的承诺令人鼓舞。

我还要回顾尼日尔境内的七名重新安置人员——这是在设立特设法庭时无法预见的另一项挑战，需要国家大力干预。事实上，12月27日将是重新安置人员被事实上软禁的两周年，如果尼日尔尊重它与联合国达成的收容他们的协议，这种不可接受的情况是可以轻易避免的。尽管余留机制作出了努力，但仍然看不到解决办法。我们继续努力寻找解决办法，我

们需要安理会的支持。我再次敦促各国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协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

然后是破坏我们的工作和判决的令人不安的各种企图。我指的是否认种族灭绝和修正主义以及美化战犯的日益增长的趋势。这以多种形式出现,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否认、淡化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或为之辩护。否认种族灭绝事关我们所有人,保护真相是防止暴行再次发生的最好方式。各国在驳斥这种说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获取信息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余留机制正在尽其所能,包括根据第1966 (2010) 号决议为新闻中心提供便利,并开展其由欧洲联盟资助的宝贵的外联活动。

当然,这些挑战与其他挑战并存,例如有些国家断然拒绝配合余留机制在诉讼较早阶段发布的命令。在这方面,我要提到塞尔维亚持续不执行逮捕令和移交约伊奇和拉代塔藐视法庭案被告的命令。这种行为,特别是在藐视法庭的情况下,试图削弱余留机制的司法程序,并直接挑战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在这方面,我们也呼吁安理会的帮助。

(以西班牙语发言)

最后,余留机制随时准备在明年的审查期间进行合作。我们致力于尽我们所能,确保我们的剩余活动取得最佳结果。无论这些长期余留职能是由机制自行完成,还是适当移交其他合适机构完成,都必须认真贯彻到底。我们的宝贵遗产——安理会的宝贵遗产——要求特设法庭开始的开创性工作必须以履行联合国75年前所作承诺的方式完成。

我感谢各位议员的关注,并欢迎他们就未来的工作向提出意见。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感谢加蒂·桑塔纳法官的通报。

我现在请布拉默茨先生发言。

**布拉默茨先生**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各位成员给我机会再次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我的办公室的活动

和成果。我的书面进展报告(见S/2023/566)提供了详细情况。今天,我将重点阐述几个关键问题。

我的办公室已经完成了起诉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最后案件的重要任务。今年5月,上诉分庭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作出判决。上诉分庭接受了我的办公室的论点,即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作为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片地区进行种族清洗的合谋犯罪的参与者应承担刑事责任。正如我们一再证明的那样,这些罪行是处于权力顶端的高级官员犯下的,他们煽动仇恨和恐惧,并发动难以形容的暴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我们必须确保记住的教训。并不是塞族人、克罗地亚族人或波什尼亚克族人有罪,这些罪行是个人所为。我们起诉和定罪的是这些来自所有族裔群体的人。

正如加蒂·桑塔纳主席所报告的那样,卡布加案的审判程序已经结束。我的办公室和所有相信正义的人都只能感到极大的不满,当然不是对法官不满,因为他们的决定遵循了过去的先例,必须得到尊重。我们的不满是认识到卡布加罪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正义。卡布加不会因为他在卢旺达人民的苦难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受到审判。但我们有能力确保其他罪犯受到审判,特别是那些继续藏匿在世界各地散居社区的人。

菲尔让斯·卡伊谢马于今年5月被捕,目前仍被关押在南非,等待初步转移到阿鲁沙。我们相信,南非当局将确保将卡伊谢马移交给我们,不再拖延。继11月14日进一步宣布阿罗伊斯·恩丁巴提死亡后,我的办公室预计,我们将在明年查明最后两名逃犯的下落。

随着审判和上诉工作的完成,我的办公室现在坚定地把重点放在我们剩余的余留职能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向国家当局提供的援助,继续追究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罪行的责任。我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安全理事会的设想,即由国家法院全面接管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职



能。按照这一完成工作战略,安理会指示我的办公室响应国家伙伴提出的援助请求。卢旺达当局仍然寻求将1 200多名在逃的灭绝种族首要分子绳之以法。同样,前南斯拉夫检察官仍然有1 000多名战争犯罪嫌疑人有待调查,并在必要情况下提起诉讼。

我们还收到第三方会员国,尤其是欧洲和北美洲会员国国内主管机关的请求。过去几年,我们每年收到300多项援助请求。这显然表明很多情况需要我们给予支助。国家检察官一贯加强了这些行动。最近几个月,我再次访问了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就国内司法程序和需要我的办公室给予的支助进行协商。在卢旺达,尤其是包括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在内的对话者强调,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把1994年对图西族实施种族灭绝期间犯下罪行的那些人绳之以法。为实现其目标,他们请求我的办公室给予大力支持。同样,在前南斯拉夫,该区域和我的办公室负责战争罪行的全体检察官最近举行年度会议,讨论执行其国家工作战略,还讨论了关于如何克服诸多剩余挑战的解决办法。他们再次强调,他们依靠我的办公室继续提供援助。

大体而言,我们应要求向我们的各国伙伴提供三种形式的援助。

第一,我们提供我们的证据库所含证据和信息,证据库总共有1 100多万页,有数千小时的影音资料以及实物。我们的证据库是一项独一无二的资源,是关于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所犯罪行的最翔实全面的证据库。

第二,我们利用自己先进的专门知识,在多种法律、取证、起诉和战略事项上提供援助。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国家检察官编写调查案卷,内容涉及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案件有关的需要优先弥补的究责漏洞。

第三,我们应要求向国家检察官提供与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各国逍遥法外的逃犯有关的专家支助。这涉及向我们的各国伙伴直接提供关于这些在逃犯案件的行动和外交支助。我们相信,我们的这项努力将得到安全理事会、会员国和联合国的全力支持。

我的办公室期待安理会即将对余留机制的工作进行的审查,审查将在今后几个月内开始。我们再次欢迎有机会同安理会就余留职能和其它重要事项进行深入接触,包括在昨天的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会议上。应安理会的要求,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正在最终完成它对余留机制方法和工作的评估,这将成为审查进程的一部分。今年,监督厅的评估将侧重于余留机制同会员国的合作,尤其包括我们如何响应会员国的需求,以及我们如何为国内司法程序做出贡献。在余留机制变为纯粹的余留机构的情况下,评估侧重于这一点尤为妥当。我的办公室一如既往地以透明方式向监督厅提供渠道,以查阅我们的记录并接触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时还提供所要求的一切其它支持和协助。我们欢迎监督厅提供建设性反馈意见,并等待其报告和建议。

最后,本月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通过七十五周年。《公约》的通过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特设法庭成功起诉了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实施的灭绝种族罪行,大大推进了对该项罪行的惩处。我们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所发生的事实,包括罪犯打算全部或部分地毁灭受保护群体的行为事实。我们还极大地发展了该项罪行的判例,特别是确认了针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包括强奸和强迫迁移在内的罪行有可能是灭绝种族计划的一部分。

国际社会起诉灭绝种族罪行的义务没有失效期。虽然对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罪行的国际审判现已结束,但是各国检察官在我们的支助下,继续在其本国法院开展工作。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数千名罪犯仍有待起诉,每个会员国都有责任和机会发挥自身作用,提供充分合作和有效支持。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否认是灭绝种族思想的最后手段。否认是为了抹除受害者和罪行。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查找并惩处罪犯,我们同样有责任确保真相得到维护和宣扬。如果我们要真正防止和镇压这种“罪中之罪”,这就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赋予我们的最大责任。我的办公室始终感谢安理会对我们的全部努力给予持续支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布拉默茨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比昂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审议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进度报告（见S/20223/566）。我还要感谢余留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根据第1966（2010）号决议和第2637（2022）号决议第12段，分别就这一国际机制的第二十三次工作进度报告所作的通报。

我荣幸地作为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发言。这无疑是我最后一次以这一身份发言，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向全体会员国深表谢忱，感谢它们给予我宝贵支持，以及它们在我整个任期内表现出的合作精神。我还要感谢秘书处的高质量技术协助，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履行主席职责，而且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我还要再次最热烈地赞扬大家在我们整个审议过程中普遍表现出的妥协精神和高度责任感，使第2637（2022）号决议得以通过。我相信，执行该项决议将显著促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为了和平与安全以及正义而打击有罪不罚。

在继续发言之前，我谨向我的继任者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和我的代表团愿随时为其提供帮助，以便在他们认为必要时，支持他们的努力。

今天的会议是在安全理事会于1993年5月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整整30年之后举行的，设立这些法庭是为了有效打击在这两国发生对它们有影响的严重事件之后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我要强调，打击有罪不罚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加蓬全力支持余留机制在审查所涉期间所作的努力，尽管它在根据第1966（2010）号决议执行其余留职能时面临诸多挑战。我们赞赏司法程序的效率和速度、对被告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对证人身份的保护。

加蓬欣见主席办公室始终注重执行路线图，路线图所依据的战略催生了一个纯粹的余留机构。我们欢

迎把重点放在通过公平进程来招聘称职的工作人员，并加强相关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便在预期时限内完成余留任务。我们认为，这种侧重于加强现有工作方法与工具的做法是促成有效过渡以完成余留机制的剩余职能的一种妥当办法，这将是确保特设法庭和余留机制造福后人的一个根本步骤。为此，加蓬支持为实现该目标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制订完成余留职能的业务框架草案。该文件概括了该机制的余留职能，还对工作量进行了预测，包括追踪逃犯、监测已移交国家司法管辖机构的案件、监测判刑的执行、管理档案以及保护证人等方面的工作量。在余留机制主席强调的这种尤为敏感的情况下，我们鼓励主席与安全理事会和各种利益攸关方保持密切和持续的协作。

在司法程序方面，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一案的结束对于1992年巴尔干发生的违反战争法规和习惯、递解出境、不人道行为以及危害人类罪来说，是一个关键步骤。它为受害者带来重要的希望，让他们相信正义终将伸张，无论这需要多长时间。我们赞扬余留机制的法官不懈努力，完成这个大案要案。我还谨借此机会，欢迎秘书长任命乌干达的莉迪亚·穆甘贝法官接替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

余留机制现在到了抓捕逃犯的一个关键阶段。我们赞扬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和检察官办公室为抓捕夏尔·瑞安迪卡尤和夏尔·斯库卜瓦博做出不懈努力，鉴于菲尔让斯·卡伊谢马已被捕，而阿罗伊斯·恩丁巴提已被证实于1997年死亡，这两人现被视为剩余的两名逃犯。打击有罪不罚必须继续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加蓬鼓励有关国家同余留机制的两个分支密切合作，以便最大限度地收集证据，这对于未来开立足够广泛的司法调查以确立所发生严重罪行的事实至关重要。我们借此机会谴责美化犯罪者的行为。

最后，我谨表示希望余留机制的工作将继续不受阻碍地进行下去，并且得到国际社会充分和有效的合作。除完成其重要的授权任务之外，余留机制的工作体现出对真理与公正的追求，充当了反对武断任性和大规模暴行的道义堡垒。为此，进一步珍视各法庭和

余留机制留下的遗产是一项崇高的职责，给打击有罪不罚、加强和促进国际刑法带来重要的优势。

**费尔南德斯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富于见地的通报和有关余留机制的最新信息。莫桑比克认为，本次辩论会是及时的，并且对于安全理事会至关重要，因为有必要对余留机制的运作做出知情的决定。

莫桑比克大力支持余留机制担负起卢旺达问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法庭的职能以寻求国际司法公正的工作。我们肯定这些国际司法机构在打击灭绝种族罪实施者的斗争中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族裔清洗、灭绝种族以及危害人类罪令人憎恶。对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应不予惩罚。卢旺达人民和前南斯拉夫人民遭受了几十年的巨大痛苦。我们负有集体的责任，追究所有制造暴行者的责任，以安慰受害者和幸存者。

莫桑比克欢迎完成余留机制涉及核心罪行的程序。我们鼓励如最初的设想和第1966（2010）号和第2637（2022）号决议所确立的那样，努力使余留机制过渡为一个小型的临时而有效的真正余留性的机制。我们承认余留机制在完成其授权任务方面面临的挑战，包括在执行判刑方面的挑战。我们强调执行国及其承诺的重要作用，它们的承诺理应得到我们的深切赞赏。

另一个需要安理会关注的方面是根据联合国和尼日尔政府之间的协议，重新安置到尼日尔的宣告无罪者和已释放者的境况。他们的境况未得到解决，令人关切，尤其是该国7月26日发生政变之后。那些已经服完各自刑期的人理应得到自由，并享有其它权利。我们必须反对我们值守下的任何形式的不公。考虑到尼日尔政治上的不稳定，我们鼓励继续努力，以找到解决这个紧急问题的可行和持久的办法。

伸张正义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本地司法。我们认为，凭借国际援助，国家当局能够——而且应该——推进问责，同时尊重受害者和被告的权利。国内和国

际司法机构为确保问责所做的共同努力不仅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而且起到确保可持续和平、愈合创伤以及和解的作用。

最后，莫桑比克随时准备支持余留机制完成其崇高使命。

**维克拉马辛哈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通报情况并且提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最新报告（见S/2023/566）。我还借此机会赞扬加蓬大使及其团队领导安全理事会的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今天，我谨发表三点意见。

首先，过去三个月来，余留机制继续卓有成效和高效率地工作，包括最近确认逃犯阿罗伊斯·恩丁巴提的死亡。我们赞扬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并附和报告发出的各国继续合作以便尽快抓捕剩余两名卢旺达逃犯的呼吁。

其次，余留机制的工作依然举足轻重。在西巴尔干，我们看到族裔-民族紧张加剧，一些政治人物令人担忧地使用仇恨言论。这种言辞加深隔阂，阻碍国家为其民众提供一个安全、包容以及繁荣的环境。法院在为所有人伸张正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反过来促进了和平与和解。因此，我们欢迎余留机制与克罗地亚政府关于在萨格勒布设立一个有关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信息中心的讨论取得进展。这些中心可以促进了解和认识历史，对于与否认暴行罪的做法相抗衡十分重要。

此外，在卢旺达展望于2024年4月纪念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事件30周年之际，余留机制与卢旺达政府继续合作努力仍然至关重要。鉴于余留机制的至关重要作用，联合王国自豪地通过执行判决来表明其支持，并在此过程中认真对待其照顾余留机制监管下的被拘留者的义务。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仍然存在若干未决问题，它们影响余留机制执行任务的能力，必须得到解决。特别是，我们对一些国家阻碍西巴尔干地区合作的有关报道感到失望。我们呼吁塞尔维亚履行其义务，在多



年的请求之后逮捕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并将他们移交余留机制。联合王国还对重新安置到尼日尔的卢旺达人的状况感到关切,这些人自2022年以来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目前仍被软禁。我们欢迎提供更多最新信息,介绍为这些人找到持久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

最后,余留机制有许多重要和敏感的工作要做,要确保判决得到妥善执行,其遗产得到保护,国家起诉工作得到支持。我们认为,该机制完全有能力履行这些现行职能,而且它正在认真考虑以精简方式履行这些职能的需要。我们期待着在今后几个月审查该机制的任务授权。

**西蒙诺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通报了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为推进追究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暴行的责任而正在开展的工作。我们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对这一重要机构的领导。余留机制继续开展大量工作,对上个世纪一些最严重的罪行伸张正义。

美国谨再次就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的逝世向乌干达表示慰问。我们欢迎秘书长任命了莉迪亚·穆甘贝·萨利法官,并祝愿她在这一职务上一切顺利。我们还期待着司法人员名册上的空缺很快得到填补。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南非当局逮捕了逃避逮捕20多年的菲尔让斯·卡伊谢马。卡伊谢马被指控犯有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因为据指控他在尼扬盖教区教堂残忍杀害了2000多名图西族男子、妇女和儿童。我们祝贺余留机制(逃犯)追踪队和南非当局在为所有这些受害者伸张正义方面取得的这一成就。我们期待着迅速、公正地结束余留机制请求将卡伊谢马移交其羁押的有关法律程序。我们还注意到,11月,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另一名逃犯阿罗伊斯·恩丁巴提已死亡。6月,上诉分庭裁定菲利西安·卡布加因健康状况不适合受审,他在被起诉26年后被捕。停止对

卡布加的审判的决定和恩丁巴蒂的去世无法挽回失去的东西,而且无疑使这些暴行的许多受害者感到失望。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追查这些案件能给受害者带来一些安慰,让他们觉得余留机制和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他们。

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一贯表明,即使最高级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也可能被追究暴行罪的责任。我们感谢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法官、律师、辩护律师以及其他法庭工作人员几十年来的工作,感谢他们为前南斯拉夫的法治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赞赏余留机制最近对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所作上诉判决的重要意义。这一期待已久的判决确认这些前政府官员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负有责任,是涉及在前南斯拉夫犯下的核心罪行的最后一个案件,结束了国际刑事司法史上的重要一章。余留机制在把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遗产发扬光大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赞赏余留机制努力通过增加查阅特设法庭和余留机制公开司法记录的途径,努力帮助打击否认灭绝种族罪的行为,并更广泛地加强与受影响国家的合作。

随着余留机制进入完全余留阶段,我们赞赏加蒂·桑塔纳主席明确提出的优先事项,包括精简其职能。我们非常期待讨论该机制的业务框架,以期完成其职能,我们非常赞赏该机制对其工作这一重要阶段所作的深思熟虑的分析。在这方面,我们赞赏余留机制努力满足各国国家当局的援助请求,以促进其国家司法系统的公正。最终,国家当局必须承担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主要责任。

正如加蒂·桑塔纳主席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余留机制今后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将是监督特设法庭和余留机制所作判决的执行工作。我们认识到,有12个国家作为执行国关押着被定罪人员。余留机制的成功运作将继续取决于与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密切合作,以确保战争罪犯服满刑期。



最后,我们赞赏并尊重受害者、幸存者及其亲人的勇气和韧性,他们继续为使在其社区犯下的暴行得到正式承认而努力。我们赞赏参加特设法庭、余留机制及其他法院审判的数千名证人的勇气。没有他们,正义就无法得到伸张。美国将继续推动伸张正义,这是他们社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耿爽先生(中国):**中方感谢桑塔纳庭长和布拉默兹检察官所作通报。

根据安理会决议,余留机制应是一个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其功能和规模将随时间逐步缩减。本次报告期间,余留机制有序推进司法活动,完成了所有核心刑事程序的法庭活动,余留机制不再有正在进行或者将要进行的核心案件的审判和上诉程序。中方希望余留机制在此进展基础上继续缩减职能和规模,合理压缩开支,继续优化财政资源的分配。

余留机制与有关国家开展务实有效合作对于其履行授权、推进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追查逃犯、信息共享、重新安置无罪和刑满释放人员等问题,中方希望余留机制与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借鉴此前的成功实践,找到妥善解决办法,携手打击有罪不罚。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国加蓬和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在协调安理会与余留机制工作方面所做工作。

**钱达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兹检察官所作的详细介绍。我们还要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卢旺达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自安理会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以来,30年已经过去。在我们准备纪念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三十周年之际,余留机制已从一个运作中的法庭过渡到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

在这一关键时刻,有必要发表一些看法,我也要就此发表意见。

首先,我们要重申我们对该机制的支持,并赞扬为执行其任务所作的努力。过去六个月取得的重大进展表明,检察官、机制主席和法官决心将犯下国际罪行的人绳之以法,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尤其欢迎从国际刑事法庭承接的最后一批案件审结。我们注意到对卡布加案和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的裁决,这标志着余留机制进入了纯粹的余留事项处理阶段。

然而,最后几次审判的结束丝毫没有削弱余留机制的相关性。相反,它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决心对于促进和平以及防止修正主义、否认暴行和美化罪犯的趋势仍然至关重要,这些趋势已向我们报告,并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

第二,该机制的未来值得我们充分关注。进入新的运作阶段后,余留机制将继续在监测判决执行情况、协助国家当局、追捕逃犯和追究许多国际犯罪嫌疑人的责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注意到新的优先事项和为完成该机制的职能而制定的框架项目,并欢迎机制主席和检察官决心优化资源和加强该机制的效力。

我们要强调,必须维护国际刑事法庭和余留机制的遗产。因此,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余留机制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就其数字保存方案进行的交流。我们也欢迎该机制努力帮助受影响社区,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好地了解所犯罪行的事实,并认识到他们的痛苦。

第三,有效打击国际犯罪需要持续并经强化的合作。该机制将履行的职能至关重要,它必须能够指望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此外,余留机制必须能够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我们对某些国家在逮捕和移交嫌疑犯方面缺乏合作感到遗憾,并敦促它们在这方面加倍努力。我们还鼓励各国加强其在刑事事项方面的区域合作框架,并在这方面欢迎检察官在西巴尔干国家所作的努力。我们还欢迎检察官努力加强国家能力,并对要求援助的请求作出回应。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余留机制在这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在尼日尔重新定居了两年多的7个人的情况仍未得到解决。

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和余留机制自成立以来，已将许多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犯罪人绳之以法，并承认受害者的痛苦。随着该机制进入纯粹的余留阶段，我们必须全力支持它，直到它完成工作。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促进正义、问责与和平。

**莫雷蒂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提交关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活动的最新报告(见S/2023/566)。我还赞扬他们致力于完成该机制的任务。

这是巴西在我们目前任期内最后一次就该机制的活动发言。自2022年1月以来，我们有幸密切关注与该机制有关的所有活动，并参加了安理会关于该机制的辩论。在这一位置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最佳的视角来审视余留机制在终止其职能方面，尽管为此作出了努力，但仍然面临的挑战。

安全理事会的构想是，该机制是临时性机构，其职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这意味着必须有完成其活动的明确时间表。虽然我们对工作人员士气和工作环境面临的挑战感到遗憾，但总体而言，我们理解有必要减少2024年的拟议预算并缩减人员和资源。

我们还欢迎核心司法案件最近结案。然而，在无法将余留职能移交国家司法机关的情况下，该机制应履行一些长期的余留职能，包括监督判决的执行、保护受害人和证人、请求进行司法审查以及保存档案。

追踪逃犯也是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一项关键职能。我们呼吁与检察官办公室充分合作，以逮捕其余两名逃犯。我们还强调，必须与余留机制合作，执行尚未执行的逮捕令和移交令，并重新安置被判无罪或刑满释放人员。

余留机制继承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案件和余留职能。

保护它们的遗产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借由通过第2637(2022)号决议，允许该机制继续工作两年。在余留机制检察官和法官目前的任期于6月届满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余留机制仍然需要时间和资源来完成其授权任务。该机制负责人最近提出的完成各项职能的明确行动框架草案，为安全理事会指导该机制今后的任务提供了重要投入。

巴西重申，各国负有追究在其境内犯罪者责任的首要责任。国际法庭是对国家司法系统的补充。当国家机构不能或不愿自己审判这些罪行时，国际法庭必须采取行动。补充性原则确保国家保留为其公民伸张正义的权利，尤其是为其公民伸张正义的义务。确保对严重罪行追究责任的强有力国家机构使其社会更能抵御重新陷入冲突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盖特女士(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也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通报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目前的工作。

在我们等待明年春天审查之前的内部监督事务厅的评估时，我们赞扬机制主席对开展未来规划活动的关注，以及对大会10月份宣布的三个新优先事项的重视(见A/78/PV.19)。我们期待着就昨天提交给我们的完成各项职能的行动框架草案进行建设性讨论。

虽然我们欢迎各分庭在完成司法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但我们也认识到，需要继续开展执行判决、保存档案、保护证人，特别是协助国家司法机构的工作。我们向机制主席和检察官保证，我们将在这方面给予合作。

马耳他还完全支持检察官办公室的优先事项，重点是找到和逮捕剩余的逃犯，并协助国家司法机关起诉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境内犯下的国际罪行。

通过协助国家当局，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在促进全球法治和问责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肯定为建设国家司法机构能力所作的努力，例如为来自斯威士兰和加纳的检察官举办的关于起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罪行研讨会。检察官办公室对国内法律改革的支持是

另一个重要领域，可以推动有效起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

我们也欢迎在追踪和清查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所起诉其余逃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赞同该报告（见S/2023/566）呼吁各国合作，确保尽快将其余逃犯绳之以法。我们认识到余留机制在执行方面的挑战，希望有能力的国家承担起执行责任。我们与该机机制一道感谢并赞扬报告中提到的12个执行国家。

余留机制及其前身在确立事实以及提供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所犯暴行罪的历史记录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在这方面，我们同意机制主席的看法，即让特设法庭和余留机制的公开记录更容易查阅至关重要。我们欢迎该机制与卢旺达当局就增加查阅档案机会等事项进行接触，也欢迎就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建立一个信息中心进行深入讨论。这些都是应对否认和修正事实的危险的重要步骤，有助于和解与愈合创伤。确保反映受影响社区意见、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中心的强有力做法也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也要赞扬加蓬作为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所做的工作。正如机制主席在题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30周年”的会议上所说，

“尽管困难重重，但法庭超越了不断演变的实质和程序，并帮助创造了一种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新的法律文化。”

特设法庭的遗产必须如此——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文化。

**斯塔斯托利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欢迎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来到安理会，并感谢他们对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的实质性评估。

我们赞扬余留机制在执行其任务方面下定决心，要起诉并依法惩处被特设法庭指控的人。

阿尔巴尼亚欣见余留机制于5月31日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一案作出上诉判决，这标志着提交法

庭的所有核心罪行诉讼程序的结束。这是国际司法的一个里程碑，为数以千计的受害者提供慰藉，并提醒他们：国际社会也无法免受其苦难的影响。

同样，阿尔巴尼亚欣见5月24日逮捕在逃22年的菲尔让斯·卡伊谢马。

我们注意到并将继续关注审判分庭在起诉菲利西安·卡布加一案采取的步骤。

尽管余留机制目前正从一个运作法庭过渡到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但我们赞赏机制主席关注：首先是在该机制处理余留事项的新阶段完成各项职能的运作框架；其次，在履行受权职能以及完成余留工作方面的有效领导和善治；第三，巩固特设法庭和该机制的遗产，并与所有主要利益攸方密切合作，特别是支持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国家司法机构以及对援助请求作出回应。

正如报告（见S/2023/566）所指出的那样，司法周期不会随着宣布判决或庭审终结而结束。判决的执行仍然是必需的。同样重要的是，巩固特设法庭和该机制的遗产，并继续协助各国司法机构审理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冲突有关的案件。最重要的是，当政治家和决策者充分和切实参与打击灭绝种族罪以及对暴行罪的否认和修正时，正义也得以伸张。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也是为了确保过去的罪行不再重演。

余留机制、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是国际司法的基石，也是生动的例子，表明国际社会致力于追究那些应对暴行罪负责者的责任。我们赞扬各位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所做的出色工作，并感谢他们为促进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法治、人权以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所作的贡献和奉献。这是在巴尔干、卢旺达和其他地方实现和解与和平共处的唯一途径。

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充分和无条件地与余留机制合作，以便没有人能够逃脱法律制裁。具体而言，我们继续敦促塞尔维亚逮捕并移交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



最后, 由于这是阿尔巴尼亚最后一次参加关于余留机制的会议, 我们重申坚决支持国际法庭和独立机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在各地伸张正义。

阿尔巴尼亚将继续与具有相同优先事项和原则的国际法庭和会员国密切合作。

**长野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内容丰富的报告和通报。

日本致力于促进法治, 包括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寻求过渡期正义, 因此支持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发挥作用。我们呼吁各国与之合作。

我们高兴地看到, 余留机制今年取得了显著进展。关于起诉, 该机制于5月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一案作出上诉判决, 并于9月对卡布加一案作出无限期暂停审判的裁决。这两起案件标志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所移交审判和上诉案的终结。同样, 在调查方面, 检察官办公室于5月顺利逮捕长期追捕的逃犯卡伊谢马, 并于11月证实恩丁巴提的死亡。我们赞赏桑塔纳主席、布拉默茨检察官以及该机制所有工作人员所作的不懈努力。

随着调查和起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 我们欣见余留机制正从一个运作法庭过渡到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虽然我们承认该机制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活动规模应随着职能的减少而相应缩小。在这方面, 我们赞赏该机制在尽早完成其余留职能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移交余留活动的可能选择。桑塔纳主席昨天向安理会成员提出关于在这一新阶段完成该机制职能的框架草案意义重大。我们也赞扬机制主席的内部重组倡议, 该倡议将减少员额和精简工作流程结合起来, 以便优化资源并提高效率。

请允许我重申, 日本继续关注并坚定不移地支持余留机制的活动。我们致力于与其他会员国和国际司法机构, 包括余留机制一道, 共同促进法治。

**科尔比耶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 我谨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根据第1966(2010)号决议第16段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其第二十三次评估报告(见S/2023/566), 该报告向安理会成员概述了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在报告所述期间的工作进展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代表团承认余留机制在终结有罪不罚现象和将剩余暴行罪实施者绳之以法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将继续支持在这方面与其他代表团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所有努力。关于该报告的内容, 加纳希望强调以下四点。

第一, 关于各国与余留机制之间的合作问题, 我们希望对余留机制在执法领域继续面临的挑战表示关切。正如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样, 各国将一些被定罪人送回联合国拘留所给余留机制带来了财政负担, 因为该拘留所不是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在这方面, 我们继续感谢12个执行国同意在执行对一名或多名被定罪人的判决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并鼓励那些考虑今后执行判决的国家也这样做。

另一个对合作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余留机制将无罪释放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加纳希望鼓励余留机制继续开展外交努力, 与接收国寻求友好解决办法。我们赞扬余留机制主席补充书记官长的外交努力, 在与各国的双边会晤中提出这些问题。5月24日, 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剩余逃犯之一: 菲尔让斯·卡伊谢马先生在南非被捕。这表明, 当各国与余留机制合作时, 就会取得进展, 并根据第1966(2010)号决议使余留机制审理的案件早日结案。一些国家的不合作导致拖延, 并进一步增加了余留机制的财政负担。因此, 我们呼吁所有窝藏逃犯的国家与余留机制充分合作, 履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责任。

第二, 加纳继续承诺支持国际大家庭的一切努力。国际大家庭负有集体责任牢记并不忘记, 暴行罪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仍然在大声疾呼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我们强调, 有时正义的车轮可能会转动缓慢,

但安理会需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并承认,如果我们在灭绝种族期间没有尽到保护受害者的责任,我们就有集体责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追究犯下滔天暴行的人的责任,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都对我们充满期待,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第三,关于互补性问题,我们继续赞赏地注意到检察官办公室与国家检察机关之间持续合作,向它们提供获取证据的渠道——这种合作的一个例子导致,如果在南非用尽法律程序,卡伊谢马先生即将被移交卢旺达接受审判。这也要符合相关移交决定中规定的条件。我们敦促余留机制继续开展此类活动,因为这一事态发展有助于根据互补原则建设受影响国家国家检察机关官员的能力。

最后一点是,加纳注意到为保护证人而采取的措施。我们注意到,余留机制进行了威胁评估,并根据司法保护令,更重要的是,与国家当局合作,协调应对与安全有关的需求的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将鼓励其他受害者在被传唤作证时不收回证词。

最后,如果我在结束就这一议题向安理会所作的最后一次发言时,没有赞扬余留机制主席和检察官及其工作人员为执行任务将暴行罪实施者绳之以法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那将是我的失职。我还要感谢加蓬大使米歇尔·比昂及其代表团干练地担任了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

**扎博洛茨卡亚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和首席检察官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并感谢加蓬代表团担任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

第1966(2010)号决议设立了余留机制,并授权其成为一个小型、临时和高效的机构,其职能和规模将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减。鉴于余留机制的待审案件目录现已清空,其领导层现在应按照安全理事会的要求,集中精力缩减其活动。这应该是主席和检察官提交的报告重点。然而,安理会收到的这些冗长的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理由来延长余留机制的存在。在最近的报告(见S/2023/566)中,他们描述

了朝着正确方向采取的一些步骤,包括关闭联合国在阿鲁沙的拘留设施和萨拉热窝外地办事处,裁减一些工作人员,以及计划于2024年关闭余留机制在基加利

的办事处。与此同时,报告仍未触及更全面的情况。我们没有看到余留机制缩减的任何具体日期。只有对完成其某些职能作了预测,其时限在我们看来是离谱的。有些职能甚至预测到2055年完成,尽管余留机制所继承的国际刑事法庭是30年前设立的。因此,该结构的预期生命周期现在是60年。对于一个特设法庭的寿命异乎寻常地如此之长,无法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我愿回顾,审理一类同样严重罪行的纽伦堡法庭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将其档案移交给了国际法院。而且,正如我们所知,没有建立任何传播知识和历史的余留机制或中心。当然,这或许是个失误。但这依然是事实。

我们还回顾,2004年,第1534(2004)号决议指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到2004年底完成调查,到2008年底完成审判,到2010年底完成全部工作。该法庭没有在最后期限内完成任务。人们对取而代之的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将弥补其前任各种繁文缛节的期望没有实现。13年之后,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预计至少到2055年它还会存在。

我们注意到,在国际余留事项处理机制主席的报告第109段中,对可能对菲尔让斯·卡伊谢马一案启动新的上诉程序一事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我们谨回顾指出,2012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决定将此案移交卢旺达法院审理。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可能的理由要在12年后审查这一决定。

我们还对目前人为增加对所谓藐视法庭程序案审判数量的企图持警惕态度,这并非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涉及起诉根据国际法涉嫌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员。藐视法庭的指控完全可以由国家法院裁决。我们认为,即便在没有待审案件的情况下,将预留机制的资源用于这一目的,也是在人为地延长其任务期限。情况变得荒唐可笑。余留机制正在考虑就最近搁

置的费利西安·卡布加之案提起一个新的藐视法庭案。因此，不会进行主要审判。然而，出于某种原因，余留机制将处理一个次要的案件。这种情况难道只是令我国代表团产生疑问吗？

然而，余留机制并非像对于藐视法庭案件那样热心地履行其所有职能。它继续对无视某一类罪犯，即对塞尔维亚罪犯拘留条件的规则和最低标准的现象视而不见。据塞族共和国前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的女儿说，卡拉季奇无法让他所在的英国怀特岛皇家监狱当局为他的牢房提供正常照明。前塞族克拉伊纳（克罗地亚）共和国领导人Milan Martić和塞族共和国军队将领Dragomir Milošević多年来一直在爱沙尼亚监狱中被单独囚禁。他们只被允许与几个囚犯接触。他们还被剥夺了适当的医疗护理。余留机制拒绝对已经服刑三分之二的塞族人实行提前释放的做法。弗拉斯蒂米尔·乔尔杰维奇和拉迪沃耶·米莱蒂奇提出的此类请愿书已被驳回。我们认为，被拘留的塞族人面临的条件与1998年和1999年武装冲突期间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科索沃阿族人所面临的条件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这些人一直逍遥法外，没有人在搜寻他们。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认为他们的行动没有任何问题。

直到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迪克·马迪报告，指出他们犯下了许多暴行，包括酷刑、谋杀以及贩运人口和人体器官，欧洲联盟设立的所谓科索沃专家分庭才开始对这种行为感到关切。该法院为所谓的科索沃前总统哈希姆·萨奇等8名科索沃阿族人建立的审前拘留制度极其宽大。这包括他们享有权利，可以使用健身房、图书馆和礼拜堂，在指定地区散步，以及从一个特别账户取钱购买商品和服务。对违反审前拘留制度规则的惩罚非常轻微——警告、罚款和暂时中止某些特权。所谓最严厉的惩罚是两周单独监禁，但并不禁止使用电话。此外，仅在2022年，这些被拘留者的家属和其他人获准进行了880人次探视。此外，2023年5月底和9月初，哈希姆·萨奇先生获准前往科索沃探望其患病的父母，尽管出现恐吓其案件中证人的备受瞩目的丑闻

换言之，我们看到塞族罪犯和科索沃阿族人的拘留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歧视性的。我们要求预留机制采取措施停止这种歧视，并确保为塞族罪犯提供适当的服刑条件。特别是，鉴于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健康状况仍然极其糟糕，我们要回顾余留机制规约第26条。它授权主席根据司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决定赦免和减刑。考虑到姆拉迪奇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客观上有理由作出此种决定。我们要强调，在费利西安·卡布加案件中，余留机制考虑到类似的情况，搁置了诉讼程序，并考虑以医疗理由予以释放。我们期望预留机制保持一致，对姆拉迪奇采取与卡布加相同的做法。作为最后手段，余留机制也应该考虑将姆拉迪奇移交到塞尔维亚继续服刑，或者以医疗为由予以有条件的释放。

即将于2024年对预留机制进行的定期审查，需要明确其完成工作的时间表。过去30年来无休止的承诺和模糊的预测只会延长这一过程。安全理事会的指示必须得到执行。这是当务之急。此外，已经没有待审案件，主要审判已经结束。国家执法机构和秘书处可以处理剩余问题。我们期望下一次报告能够详细说明移交剩余职能的具体和现实的备选做法，这将使余留机制能够在具体的时间框架内完成活动。

**迪梅·拉比耶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和首席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所作的详细通报。

我要借此机会为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开展的出色工作向加蓬表示感谢，并特别感谢安妮特·安德烈·奥南加夫人，她真正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是一位真正的领导人。我们将跟随她去任何地方——如果有必要，甚至去加蓬。

法国赞扬预留机制努力执行任务，无论是结束审判、逮捕被起诉的逃犯，还是协助国家司法机关起诉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下国际罪行的肇事者。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支持其活动。



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 5月31日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作出的上诉判决是余留机制司法活动的一个关键点。对受害者而言, 它代表着司法战胜了有罪不罚。

关于卢旺达问题, 审判分庭法官6月6日在其决定中判定, 2020年在法国逮捕归案的卡布加先生健康状况不适合受审。8月7日, 余留机制上诉分庭请求终止聆讯, 并将案件退回审判分庭, 审判分庭于9月8日无限期中止程序。我们仍然鼓励余留机制设法响应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诉求。最后这两个案件标志着余留机制司法阶段的结束。

法国敦促各国按照其国际义务同余留机制合作, 支持它开展活动, 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并促进和解。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尽管余留机制主席、首席检察官以及很多会员国在安理会支持下一再发出呼吁, 但某些伙伴仍然继续拒绝这样做。当务之急是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剩余在逃犯缉拿归案。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所起诉的逃犯目前只有两名仍然在逃, 检察官已于11月14日证实, 被通缉近20年的阿罗伊斯·恩丁巴提已经死亡。在这方面, 我们欢迎5月24日逮捕例外菲尔让斯·卡伊谢马, 这是检察官办公室与南非当局以及其它国家合作的功劳。卡伊谢马被捕说明打击有罪不罚的国际合作有效率, 也有成效。

我们欢迎为余留机制活动合理化所作的努力, 我们欣见余留机制积极规划它作为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的未来。在这方面, 我们欢迎主席应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提出了一个行动框架, 以确定可能的发展路径, 并接受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建议, 以便制订未来设想。

必须就若干问题作出重要决定, 包括协助国家司法机关, 保护受害者和证人, 管理档案和监督判决执行情况。关于最后一点,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 余留机制在无罪释放人员和被判有罪后刑满获释人员的重新安置方面仍然面临困难, 需要重新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

我们欢迎余留机制主席为5月15日在巴黎通过《国际刑事法官伦理原则》做出贡献, 它是法国支持的伦理项目的一部分。

最后, 我们要重申以下关键内容。我们始终深为关切否认犯罪的做法和仇恨言论, 以及美化国际刑事法庭遵循公正独立程序予以定罪的灭绝种族罪犯和战争罪犯的行为。

**阿扎姆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 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首席检察官塞尔日·布拉克茨先生作了十分有价值的通报。我也欢迎克罗地亚、卢旺达、塞尔维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我要借此机会表示, 我国代表团赞赏加蓬代表团在2022年和2023年付出努力, 成功担任了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

拉伯联合酋长国重申, 余留机制在履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余留职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贡献一直至关重要, 帮助实现并确保伸张正义, 保护了严重国际罪行受害者的权利, 并打击了有罪不罚。我们愿借此机会, 重申国际社会必须解决此类犯罪的根源, 而仇恨言论、歧视和种族主义往往助长这类犯罪。我们将继续监督余留机制履行其核心职能的进展情况, 包括与卡布加案审判程序因所谓健康问题而无限期中止有关的事态发展。

我们赞扬余留机制继续努力提高成效和效率, 并减少其工作量。我们敦促它遵循安全理事会关于使余留机制成为一个其职能随时间推移而减少的临时有效机构的设想, 把制订未来规划作为重点。因此, 我们赞扬它在其工作中取得进展, 从而最终成为当初设计的真正余留机制。在此情况下, 我们敦促余留机制继续履行其授权任务并取得进展, 尤其是在监督判决的执行方面, 向国家司法机关提供帮助, 以及保护受害者和证人。

我们愿强调, 各国在追究罪犯的罪责方面负有首要责任, 与此同时, 我们承认国际机构在实现国际正

义方面发挥补充作用。我们还赞赏余留机制法官和检察官办公室带头努力精简继和完成他们未完成的工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直接相关的各国遵守其义务,与余留机制合作,同时支持它完成任务。确保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是缅怀受害者的最佳方式。

最后,由于这是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最后一次参加关于余留机制的会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申明,根据《联合国宪章》加强国际司法和法治,对于使国际社会能够有效和可持续地实现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现在以厄瓜多尔代表身份发言。

我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所作的发言,我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卢旺达和塞尔维亚代表今天来到安全理事会。

我同其它代表团一样,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加蓬担任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所做的工作。

今天,当国际法治受到威胁和表明司法机构能够不辱使命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余留机制是一个榜样,表明国际社会作出有力的持久承诺之后可以取得何种成就。我要着重强调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报告中的以下内容(见S/2023/566)。

第一,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以及卡布加案审结,标志着余留机制朝着变成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过渡。余留机制没有更多判决要作,因此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安理会2010年赋予它的更长期职能。因此,我们欣见机制主席已经确定,其优先事项之一是提交一个完成余留机制职能的行动框架,该框架应当提供一个完成全部活动的时间表,以及移交这些活动的选项。我们建议该框架将内部监督事务厅和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法官小组的建议纳入考虑。

第二,余留机制应当继续履行职能,例如监督判决的执行,逮捕被告和追踪逃犯。鉴于其履行职责的能力取决于各国的合作,我们呼吁各国体现出集体责

任感,将国际罪行的犯罪人绳之以法。我们赞赏检察官办公室开展工作,证实了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逃犯恩丁巴提已经死亡,我们鼓励该办公室查明剩余逃犯的下落。我们支持该办公室采取行动保护证人,并加强国家司法机构能力。

101第三,我们认识到巩固余留机制和特设法庭遗产的重要性,不仅在判决方面,而且在移交给国家当局的证据和专门知识方面。我们同意,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确保公共司法记录可以查阅。传播余留机制的遗产也是反击历史修正主义言论和美化战争罪犯的最有力工具之一。厄瓜多尔反对所有形式的此类做法,因为它们破坏了为受影响社区实现和解的努力。

最后,我们重申致力于支持余留机制及其重要工作,以确保彰显国际刑事司法。

我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卢旺达代表发言。

**Rwamucyo先生** (卢旺达) (以英语发言): 卢旺达欢迎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开展的工作,并珍视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与卢旺达政府之间的良好合作。

必须重点指出的是,余留机制已正式承认卢旺达有能力严格按照国际正当程序标准进行灭绝种族罪审判。近年来,卢旺达对余留机制移交给我们的案件有效展开了审判和上诉工作。尽管有此积极事态发展,但鉴于上诉数量巨大,我们继续感谢余留机制持续提供合作和支持。此外,卢旺达预计检察官办公室将继续协助卢旺达应对1000多名灭绝种族罪逃犯带来的持续挑战,从而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

上周我们纪念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七十五周年的重要纪念日,我们在重温《公约》的核心原则,即预防和问责。对卢旺达来说,问责不仅限于1994年对图西人实施灭绝种族罪负有责任的个人,还涉及这些图西人所寻求避难的国家根据《公约》概述原则对个人进行审判的责任。

截至2023年12月，卢旺达已在33个国家和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对灭绝种族罪嫌疑人发出1000多份起诉书。有鉴于此，我们敦促起诉书送达国家加大力度配合逮捕其辖区内的这些逃犯。

我们感谢表明其伸张正义之承诺，从其境内引渡或在其境内起诉逃犯的国家，包括比利时、法国、美利坚合众国、乌干达、荷兰、加拿大、挪威、德国、丹麦、瑞典、马拉维、刚果共和国、芬兰和瑞士。它们的行动突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伸张正义并非不可实现，而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若干决议，但仍有一些国家明显不愿意合作。尽管可以选择驱逐出境、引渡或在其境内进行审判却仍不作为，这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构成重大障碍。

确保为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罪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不能止步于起诉。根本问题在于确保及时伸张正义。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拖延都等同于正义被剥夺，而且不幸的是，某些会员国不予配合往往阻碍进展，尽管安全理事会有明确的授权和法律文书敦促合作。这些拖延不仅妨碍正义得到伸张，而且也有碍罪犯因其罪行接受审和追责的可能性。突显这一挑战的一个近期的案例是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审判分庭做出的菲利西安·卡布加健康状况不适合继续受审的裁决——这一结果令幸存者、受害者和全体卢旺达人民深感灰心失望。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任务不应由卢旺达独自承担，而是我们国际社会必须集体承担的责任。我们强烈呼吁所有会员国考虑在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行为中所犯下罪行之严重性、幸存者长期承受痛苦以及有罪不罚现象持续不断可能带来不稳定。逃犯逍遥法外的每一天，就是正义迟到的一天，众所周知，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法庭就否认灭绝种族行为的情况定期提交报告。卢旺达和许多其他国家也对此议题表示严重关切。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谴责否认灭绝种族行为的现象。卢旺达欢迎对干扰证人陈述以篡改既定事实的人予以起诉。我们同意法庭的观点，即藐视法庭是否认灭绝

种族行为的一种形式，犯有藐视法庭罪的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关于被判无罪和获释人员的重新安置问题，卢旺达希望提醒安理会，在与法庭负责人的所有会晤中，卢旺达政府一贯明确表示，被法庭判无罪和释放的9名卢旺达人如果愿意，可以自由返回并在卢旺达生活。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他们肯定不会是第一批返回卢旺达并与所有其他卢旺达人并肩生活在一起且充分享受权利的卢旺达人。数十万卢旺达人，前难民、战斗人员或曾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前罪犯就是这样，他们今天与种族灭绝幸存者和平共处、比邻而居——这证明了卢旺达团结与和解的成功。然而，返回卢旺达的决定要由他们自己作出。我们认为非常令人质疑的是，为什么被判无罪或被获释人员，今天已是自由身，在法庭也没有诉讼案件，却继续给国际社会造成负担，要靠会员国摊款帮助。

最后，让我们思考幸存者的痛苦，由于知道施害者依旧逍遥法外，他们依然不得安宁。他们，甚至是我们所有人，都渴望有一天正义能不再迟到，罪犯终将为其行为负责，受害者能知道其苦难没有被遗忘而聊以慰藉。我们呼吁收容灭绝种族逃犯的会员国向卢旺达提供司法合作，将逃犯绳之以法，追究其在1994年对图西人犯下的灭绝种族罪行。只有在有政治意愿的情况下，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发言。

**拉古姆季亚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女士，当然还有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就余留机制工作进展报告（见S/2023/566）所作的通报。

余留机制目前正转向长期履行余留职能，我们赞赏对其运作模式的这一新阶段作出详细预测。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今年，我们纪念国际刑事司法方面的若干里程碑——《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七十五周年；



安全理事会决定成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并随后成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30周年；余留机制从两法庭接手余留职能10年周年。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了国际刑事司法的许多成就和胜利，尤其是通过就灭绝种族罪作出开创先例的裁决，其中援引了《灭绝种族罪公约》来追究这一罪行的责任并支持预防这一罪行。

这些本质上相互关联的动态无论是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还是对国际刑事司法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就我们而言，虽然我们想利用每一个机会提醒自己注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失败，但是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这样做，以便汲取我们亟需汲取的教训，不再重蹈覆辙。这些开拓性机构的工作对于我们了解过去和未来至关重要。它为无可争议的历史记录做出了贡献——这是打击否认与修正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且发出将承担后果的鲜明和果断的警告。致力于伸张正义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我们防止今后犯罪的最宝贵工具。

就我们而言，我们致力于调查、起诉和惩治所有对战争罪负有责任的人，无论罪犯的国籍、族裔、宗教或政治派别或者任何其他关联。我国经修订的战争罪战略载入了旨在克服阻碍高效处理这些案件的剩余挑战的措施。这将有助于为战争罪受害者伸张正义，并支持国家走上实现和解与持久和平的道路。今年3月30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会议成立了一个监督机构，负责监测经修订的战争罪战略的执行情况。我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次级法律框架，旨在提高处理战争罪的效率和质量，从而帮助落实该战略的目标。在这方面，已采纳的规范性框架对新登记的战争罪案件的管理和涌入进行了控制，已使司法系统内登记的未决战争罪案件明显减少。

此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及其检察官办公室的活动进行协调，这改进了该机制按照经修订的国家战略的第三个目标移交诉讼程序的职能，从而推动了基于每起案件的法律复杂性，按照司法级别更有效地分配战争罪案件。

该战略的目标之一是区域合作，这种合作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约3000名涉嫌在前南斯拉夫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人员尚未接受司法审判。仅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所有未决案件总数中，就有超过35%的案件涉及我国国内刑事起诉当局无法触及的人，其中63.3%的人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黑山或塞尔维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通过地区国家司法部与区域检察机关沟通的渠道存在问题。鉴于这些挑战，必须开展更多的工作加强区域合作。

在被告诺瓦克·杜契奇逃往塞尔维亚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请求塞尔维亚司法当局承认并执行该案的最终判决，但塞尔维亚司法当局从未对判决采取行动。如今，杜契奇是一位居住在塞尔维亚的塞族共和国退役将军，一直逃避他应服的刑期。这不仅有害于我们两国之间重建信任和面向未来的开放关系的脆弱进程，而且还违背所有文明规范以及人道、正义和法治原则的言论长期存在。在这方面，余留机制的援助至关重要，我们感谢检察官办公室给予的支持。然而，切实伸张正义的主要责任现在在于国家司法机构，检察机关之间有效和开放的区域合作至关重要。无法触及嫌犯或被告不仅削弱我国法院履行该项重大责任的总体效力，还助长有罪不罚现象，阻碍本地区的和解进程。

我现在想扼要谈谈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遗产问题。两法庭的判例已成为当今国际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整合、保存和提供所有文件、证据和记录——包括实体和数字文档——仍然至关重要。这些文档是超越单个历史时刻的见证，也是未来将长期存在的遗产。因此，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提供充足的支持，使这一重要进程能够妥善完成。

然而，我想进一步指出，法庭和余留机制的档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近代史的档案，对我们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们认为，历史环境要求这些档案材料应该存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最重要的是，这些材料是主要由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机构提供给法庭的文献证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占出庭证人——不幸的是，也占受害者——的大多数，因为在前南斯拉夫解体期间的战争中所犯的大多数罪行确实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因此，法庭的档案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近代史的档案，对我们——特别是受害者及其亲人——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我们赞赏2018年根据第1966 (2010) 号决议建立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萨拉热窝信息中心，这促成了信息传播和查阅公共司法案卷，朝着现代数字转型和充分保存档案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愿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希望并支持对所有档案材料进行全面、最先进的数字化处理，这些材料将用于正在进行的审判，特别是研究和教育，并且将视材料的性质，在规定对其进行可信的保存、保护以及最终妥为展示的法律框架内，供公众查询。

最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合作一直稳定而全面。我们将继续这种密切合作，以实施我国的战争罪战略，推进调查和起诉，审结现有的积压案件。我们将坚定不移、不知疲倦地支持余留机制完成其工作，并且下定决心揭露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所犯罪行的真相，并伸张应有的正义。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尔维亚代表发言。

**斯特万诺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加蒂·桑塔纳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报告（见S/2023/566）和今天的通报。

根据第1966 (2010) 号和第2637 (2022) 号决议，余留机制的具体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其职能和规模将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减”。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加蒂·桑塔纳主席表示打算努力确保余留机制能够毫不拖延地完成其余留工作。然而，它的某些活动表明，其存在有延长之势。

余留机制主席在报告中还指出，彼得·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藐视法庭案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再次强调，塞尔维亚对该问题的处理绝不以任何方式构成违背我们的国际义务，而是表明我们努力按照第1966 (2010) 号决议行事。塞尔维亚仍然准备对该案和所有其他类似案件进行刑事起诉。我们呼吁余留机制根据证据，包括塞尔维亚先前向余留机制提交的文件，重新考虑其决定，以便使约伊奇和拉代塔案能够移交我国司法当局。

在上次报告所述期间，余留机制确认了对沃伊斯拉夫·舍舍利和其他4人藐视法庭的起诉。决定是否将这些被告的案件移交给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在这些诉讼中不会出现像约伊奇和拉代塔案中那样的疏失。我们坚决保证，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司法系统拥有适当的法律和机构框架，能够以透明和完全合格的方式受理和处理这些案件。在这些诉讼程序中，塞尔维亚将与余留机制保持充分合作。

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重申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请求。

首先，我们坚持要求全面归还以前提交给该机制的文件。余留机制主席和检察官在以往和当前的报告中显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第二，我们强调需要审查新制定的提前释放和假释标准。似乎可以合理认定，制定这些标准主要是为了延长余留机制的运作，结果是被定罪的个人受到不平等待遇。鉴于所有被定罪者都已步入晚年，健康状况普遍不佳，需要迅速处理提前释放或假释的请求。

第三，我们再次表示愿意在余留机制的全面监督下，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执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余留机制判处的监禁。不能在前南斯拉夫国家执行判决的说法是基于秘书长1993年的报告（见S/25704），与第808 (1993) 号决议第2段也是一致的，但我们认为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起诉战争罪完全属于国家司法系统的管辖范围，我们没有看到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被定罪

者不该在本国服刑。这将在余留机制的监督下进行，授予该机制充分的权力，包括在提前释放和假释等事项上。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患有几种严重健康疾病的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保健。我们重申，余留机制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受大会1988年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见大会第43/173号决议）的约束。然而，姆拉迪奇提出的就其健康状况举行听审的请求被余留机制主席拒绝。塞尔维亚认为，有必要举行听审，以便就姆拉迪奇将军目前的状况和他在拘留地点的治疗困难提交相关医学证词。在这方面，必须让姆拉迪奇、他的律师和家人能够查阅他的所有医疗记录，因为我们看到的迹象表明，目前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在检查和听证后，确定姆拉迪奇在目前的拘留地点无法得到适当治疗，余留机制应根据第1、第3、第23和第24条原则，考虑人道主义释放，确保他在护理或医疗设施中得到适当治疗。塞尔维亚愿意提供协助，为姆拉迪奇的全面检查提供合格的医务人员，并愿意在他因人道主义理由获释后，在余留机制规定的任何条件下为他提供便利。

同样关键的是，要在检察官报告中强调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战争罪诉讼中合作的法律框架问题。检察官一贯忽视现有法律框架的存在，这些框架不仅植根于国家立法，还植根于欧洲委员会的两项公约，它们对身为该机构成员的两国都有约束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再次强调，关于塞尔维亚否认罪行和美化受害者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塞尔维亚已成功完成了许多法律诉讼，对在前南斯拉夫犯下的罪行，尤其是涉及塞尔维亚公民或同胞的罪行施以严厉惩罚。此外，大量进行中的诉讼和调查强调了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承诺。

最后，必须承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留下的遗产应该对批评持开放态度。无罪开释——例如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犯下可怕罪行的拉穆什·哈拉迪纳伊，在波德里涅犯下严重罪行的纳赛

尔·奥里奇，在克罗地亚犯下严重罪行的安特·格托维纳——是该机制历史的一部分。这些判决加强了对塞尔维亚人民所犯罪行的有罪不罚政策。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西蒙诺维奇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加蒂·桑塔纳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提交报告（见S/2023/566）并在今天通报情况。

在余留机制的这一转折点，在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有关的最后一个核心犯罪案件结案以及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案的诉讼程序无限期中止之后，克罗地亚要重申，我们坚决支持余留机制的工作，支持它向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过渡。

我们重申2023年5月对前塞尔维亚安全部门高级官员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所下达判决的重要性，他们参与了由已故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共同犯罪集团。该判决确定了塞尔维亚最高领导层与在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犯暴行罪之间的明确联系。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余留机制主席认为不得不向安全理事会再次提出塞尔维亚未能逮捕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并将他们移交海牙的问题，两人被控威胁、恐吓、贿赂或以其他方式干扰沃伊斯拉夫·舍舍利案的两名证人。这些都是重罪，因此我们重申，根据余留机制逮捕令行事是《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国家义务。藐视余留机制行为的不受惩罚，特别是不尊重和侵犯证人安全行为的不受惩罚，只会助长更多藐视机制的事件发生。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在报告所述期间，确认了对另一起藐视法庭案的起诉，即对沃伊斯拉夫·舍舍利和其他四名被告的起诉，原因是他们泄露了大量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保密信息，包括数十名受保护证人的身份信息。



克罗地亚仍然充分致力于遵守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义务, 即就战争罪相关事务与其他邻国开展建设性、透明、非政治化、基于实证的司法合作。为此, 我们需要重申, 有意义和富有成效的合作不是单向的, 除了透明公开, 还必须坚持良好做法和国际法律标准。

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 克罗地亚仍在等待塞尔维亚回应我们的邀请, 我们请它参加关于处理战争罪的双边协议的第四轮也是最后一轮谈判。我们相信, 这种双边协议的规定将防止进一步滥用法律互助工具, 帮助最终制止启动不符合国际法律标准、出于政治动机的程序的有害做法。

令人遗憾的是, 就在存在严重和公然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当前极为困难的时期, 还有人不断否认实事求是的结论、不尊重法庭和余留机制法律资质, 这种情况令人十分痛心。美化战争罪行和否认犯下的罪行, 包括斯雷布雷尼察的灭绝种族事件, 是不可接受的, 尤其是现在, 因为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明确的威胁, 因此需要我们充分、全面的关注。这加剧了受害者的痛苦, 阻碍了和解, 破坏了区域稳定。它们也会迷惑甚至毒害后代。

尽管我们赞赏余留机制在这方面的努力, 但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出在寻找失踪人员和遗体方面与塞尔维亚合作不足的问题。确定1803名失踪的克罗地亚公

民的下落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优先事项。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需要强调, 塞尔维亚缺少分享信息和允许查阅档案的政治意愿, 这仍然是我们在解决这些案件方面取得进展的最大障碍。为此, 我们重申, 确定失踪人员的命运, 找到他们的遗体并确保他们得到妥善安葬, 是结案与和解的关键。克罗地亚除了呼吁改善双边合作, 还敦促该机制在余下的短暂任务期限内, 优先支持寻找失踪人员和遗体。

最后, 我要重申, 我们大力支持余留机制的重要工作, 支持它成功完成向真正的余留机构过渡。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塞尔维亚代表请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斯特万诺维奇先生** (塞尔维亚) (以英语发言): 当然, 克罗地亚常驻代表在他就任何议题所作的每一次发言中都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念念不忘, 但我只想读一段检察官报告中的内容——这是检察官的报告, 不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报告指出, 克罗地亚在战争罪案件上与本地区各国司法机构的合作严重恶化:

“而克罗地亚司法部门几乎只关注对塞族人的……缺席起诉, 而这种起诉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正义” (S/2023/357, 附件二)。

因此, 克罗地亚的施害者仍然逍遥法外。

中午12时15分散会。